

一个台湾变节者的“革命”前史

——蔡孝乾早期历史探微

陈小冲^{1 2}

(1.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福建 厦门 361005; 2.厦门大学 台湾研究中心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迎来了一批“台湾代表”,其中的主要人物蔡孝乾参与了中央苏区反帝总同盟的创立活动,并在之后的苏区反帝运动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蔡孝乾之得赴中央苏区,是中共因应大力开展反帝斗争及红五月运动的需要而主动运作的结果,其策划者为时任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长任弼时,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也给予了指导。然观察蔡孝乾早期历史可以发现,缺乏坚定革命信仰和工作中的被动性,是他最大的特点或弱点,此或为其日后变节行为埋下些许伏笔。

关键词:中央苏区;反帝运动;台湾代表;蔡孝乾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590(2017)06-0078-08

DOI:10.14157/j.cnki.twrq.2017.06.010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一直都有来自台湾的进步青年的身影。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也有个别人未能经受住复杂残酷的斗争考验变节投敌,其中的典型即1950年春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的被捕叛变,给台湾地下党组织和党的事业带来了重大损失。研究台湾革命史,蔡孝乾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近年来随着台湾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已有学者对这一经历“由红而白巨变”的特殊对象进行了开创性的剖析与研究。^[1]不过我们发现蔡孝乾早期历史中的一个关键节点,即他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为何及如何进入中央苏区参加工作的,已有研究对此或语焉不详,或存有继续探讨的余地。由于这一问题涉及蔡孝乾人生的转折性变化,有进一步加以厘清的必要。本文即拟结合各方史料就上述议题展开讨论,并就其中的若干带争议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敬祈方家指正。

1932年6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刊载了两则似乎不那么醒目的新闻报道:

其一,1932年6月9日:

中央苏区消息 汀州各革命团体欢迎台湾代表和五华工人盛况

六月四日驻汀州各机关及汀城各革命群众团体,开欢迎台湾与五华工人代表的欢迎会,地点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新形势下推进两岸历史文化认同融合研究”(16JJDGAT002)

作者简介:陈小冲,男,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专家委员,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台湾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教授。

在福建省政府会议厅,会场布置辉煌庄严,革命群众拥挤满堂,个个兴高采烈,欢欣鼓舞异常,鼓掌声震耳欲聋。

首先由主席宣布开会意义,继致热烈的欢迎词,再由苏区共产党中央局代表报告,及各机关代表致欢迎词后,为台湾女同志施月娥演讲,极沉痛的述说台湾工农群众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屠杀和压迫的痛苦,尤其是女同志更受残酷的剥削,该女同志极愤激说“我们定要努力在苏区学习革命的理论和工作,将帝国主义推翻,完成台湾的革命。”最后为五华工人演讲,均很诚恳的表示他们愿意参加苏维埃工作的热忱,其他各代表亦均有演说,充分表示出东方被压迫民族亲密联合的精神。

最后则为游艺的表演,有台湾同志表演歌舞,口琴,提琴的独奏,各机关集体的唱革命歌曲,至十一时始闭会云。^[2]

其二,1932年6月16日:

中央政府所属的各机关 欢迎五华工人和台湾同志 并已实际参加各种革命工作

五华工人及台湾同志来苏区参观,过汀时曾有各机关热烈的欢迎已志前报,现该参观团已来到瑞金,当由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予以招待。次日即往中央印刷局参观,该厂工人表示极热烈的欢迎,借中央政府礼堂开茶话会,并赠有该厂出版的革命书籍多种。嗣后该团又往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参观。参观毕,在红校俱乐部开盛大的欢迎会,并有歌舞新戏等表演。各代表此次来苏区参观的结果,均一致热烈的要求留此参加革命工作,尤以五华工人同志(两年前五华苏维埃运动的领导者)特别表示兴奋,于本月十五日已由中央政府按各同志的特长和愿望,已分别介绍兵工厂、红军学校及中央教育部工作云。^[3]

由上可知,1932年6月中央苏区迎来了一批“台湾代表”或“台湾同志”,他们受到了苏区党、政府以及各群众团体的热烈欢迎,并且强烈要求留在苏区参加革命工作,这是中央苏区成立以来首见的情况。近年来已经有学者留意到《红色中华》的上述报道,如虞平先生的论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台湾同胞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中国”》^[4],但由于该文的相关介绍过于简单,留下了一些有待厘清的问题:一是没有弄清楚这些“台湾代表”除了报道中提到的发表演讲的女同志施月娥外,还有什么人?二是对于这些“台湾代表”前来中央苏区的原因分析,似存有商榷的余地。关于第一个问题,杜继东先生在《红白之变——蔡孝乾红白人生研究之三》一文已有所揭示:即这些“台湾代表”是蔡孝乾、施至善、施月娥等若干人;至于第二个问题杜文未曾触及,而虞平先生则认为他们是“因在国民党统治区遭受‘摧残和迫害’”,故而辗转进入中央苏区。证据是其在后来与韩国代表联合发布的一份宣言:

全中国全苏区的民众们!我们曾做过日本帝国主义宰割下的奴隶,我们是亡国奴,我们被日本帝国主义剥削得干干净净,已无田地财产,无家可归,我们在白区还要受国民党法西斯蒂的摧残与压迫,我们忍不住这种痛苦,坚决到苏区来了,我们在苏维埃政权下和中国劳苦群众一样的享受一切的自由与权利。^[5]

或许参与发布宣言的韩国代表来到苏区乃出于这些原因,抑或台湾代表里的一些人来到苏区在某种程度上亦缘于此,因为宣言的白纸黑字摆在大家的面前。然而眼见未必为实,在梳理中央苏区相关史料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至少对于蔡孝乾来说,导致他踏上苏区土地的,除了字面上慷慨激昂的理由外,还存在着鲜为人知的深层因素,颇值得关注。下面就让我们抽丝剥茧、重返历史现场。

1932年6月初,在福建漳州到江西瑞金的路上,行进着一支小小的队伍,他们先是乘坐卡车自漳州抵达和溪,然后在地方苏维埃的帮助与护送下,翻山越岭步行前往龙岩,继而经长汀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瑞金。此一行共九人,均为在漳州的台湾人,分别是蔡孝乾、施至善及其夫人、刘月蟾、施月英、施月娥、施月震、施月仙、沈乙庚。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进入中央苏区呢?这就涉及到了其中的主角蔡孝乾。

蔡孝乾(1908—1982),台湾彰化人,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读书期间,接触了瞿秋白、任弼时等中国

共产党人,受到祖国反帝爱国运动及革命氛围的影响,思想迅速左倾。1928年4月,其参与创立台湾共产党,后并与中国共产党保持往来。台共成立不久,即因上海读书会事件遭到日本特务的破坏,党的主要领导人遭逮捕,其余不得不分散隐蔽,蔡孝乾则从台湾偷渡到福建。来到福建后的蔡孝乾先后任职于国民党军张贞部训政人员讲习所、诏安公路工程处,亦曾应聘石码中学、龙溪女子中学教书。

1932年春,为了巩固赣南闽西苏区、开拓闽东南工作局面并筹集款项物资,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发动漳州战役,红一、红五军团于同年4月20日攻占福建漳州,进而以漳州为中心向闽南各地扩大发展,历时月余,达到了预期的目标。红军占领漳州期间,蔡孝乾居住在漳州半后街枕头巷,据其回忆,4月24日他在家中迎来一位访客——中共地下党员李文堂,“这次他来找我的意思,是要邀我到江西苏区去工作”。^[6]这样看来,蔡孝乾并不是如后来发布的宣言中所声称的那样由于不满国统区的统治压迫愤而前往中央苏区,而是中国共产党主动找到并动员他到中央苏区工作。虞平先生可能没有弄清这批“台湾代表”的具体组成人员,故而未注意蔡孝乾回忆录,仅仅根据其发表的宣言而对他们进入中央苏区的动机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这批“台湾代表”的九人中,中共只是请蔡孝乾前往中央苏区工作,其余的施至善一家,倒的确是自行要求一同到苏区参加革命工作,最后得到组织上的同意,但这终究属于附带的结果。在拜会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后,蔡孝乾便被临时安排在军团政治部工作,主要负责编辑《红色战士报》。

二

前面已经指出,蔡孝乾是应中共之约进中央苏区的,那么中共主动请蔡孝乾到中央苏区工作的原因何在?从罗荣桓与蔡见面时的一番话可以找到部分答案,“欢迎你到红军中来工作。我们红军和苏维埃政府非常需要文化工作者。苏区物资条件差,生活苦,只要能吃点苦,工作是愉快的。”^[7]换句话说,红军欲借重蔡孝乾的是他的文化人身份,后来让他从事的也是报刊编辑工作。蔡孝乾在台湾岛内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民族运动中,除从事台共政治运动、参与文化协会等组织外,还曾在《台湾民报》《台湾大众时报》等报刊发表过多篇文章,抨击殖民统治暴政,介入岛内文化论争,有着较强的知识素养和文化斗争经验,^[8]这对以工农群众为革命主力且处于草创时代的苏区而言无疑属于紧缺人才,应该说这是他之所以被选中的一个客观因素。不过这仅是中共主动邀约蔡孝乾进入中央苏区参加中国革命的原因之一,通过深入探究我们发现,这一看似普通的邀约与当时国内局势的变化、党的方针政策及相关重大决定有着密切的联系。

大革命失败后,虽然党的“八七会议”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但在国内外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党在之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左”的路线占据了统治地位,1931年三四月间,依据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精神,苏区中央局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在批判李立三“左”倾错误的同时,王明“左”倾路线开始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各级党的组织及苏维埃政权进行了组织人事变动并紧锣密鼓地开展从“立三路线”向所谓王明“国际路线”的转换,强调组织力量向一切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国民党反动派的全面进攻,号召发动工农暴动,夺取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党内“左”倾盲动主义主张盛行。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反对帝国主义殖民化中国的图谋及武装保卫苏联逐步成了党倾力而为的一项重大任务。反帝斗争进行得如何,在一个时期内成为辨识执行“左”右倾路线的标志之一。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由于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倾全力于解决宁粤对立及围剿中央苏区红军,加上东北军奉行不抵抗主义,日军迅速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急剧激化,反帝斗争迅速上升为中国共产党的一项主要任务。党的主要负责同志指出,“日本占领满洲的迅雷,惊醒、激发、吸引、锻炼、教训、准备了广大的新的成千上万的群众到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来。三月来的事变像强光的探海灯一样,照透了一切帝国主义强盗们的瓜分中国的阴谋

诡计 揭破了国际联盟是瓜分宰割殖民地的强盗组合 揭破了国民党统治的卑鄙、无耻、‘辱国’与‘卖国’的面目。”^[9] 加强反帝运动及组建反帝大同盟的工作迅速提上工作议程,10月28日中共江西临时省委发布《反帝大同盟章程》其主要内容为“本同盟以反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以至 AB 团社会民主党托陈取消派) 拥护苏维埃政权联合苏联及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剥削阶级争取民族解放为宗旨。”“本同盟经常工作是: 调查帝国主义在苏区内的各种组织与势力,向群众宣传帝国主义的残暴与罪恶,提高群众反帝国主义的热情,领导一切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本同盟除开各级代表会议外并于必要时召集青年代表大会或群众会议,发动青年群众参加反帝国主义反军国主义的一切斗争。”^[10] 11月,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政治决议案进一步要求“为着发展苏维埃运动,为着进行革命战争,必须加紧反帝运动及职工运动的工作,为要发展反帝运动必须坚决反对苏区只要土地革命不要反帝运动的左倾观念,必须使全党认识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才可以保障土地革命的胜利,要利用一切作反帝国主义的广大宣传与鼓动,最近要切实利用日本出兵占领东三省的事件,进行广大的反帝运动,并须在这个时间内成立苏区的反帝大同盟的组织。”^[11] 并将其作为从“立三路线”向“国际路线”转变的核心工作来抓。“坚决执行全部工作彻底转变,依据当前革命形势,党的建设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基于国际的四中全会的精神,来坚决执行全部工作的彻底转变。要与过去一切缺点与错误和各种不正确观念作无情的斗争。”^[12]

秉承党代会精神,1932年2月19日苏区中央局召开重要会议,会议通过的《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苏区党的紧急任务》决议案明确指出“中央苏区的党还存在不少的严重错误与缺点,特别是党内对于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不积极,没有鼓动起群众的革命热诚,对于领导群众的阶级斗争,尤其反帝运动与白区白军中工作一般的还是消极。”“苏区的党必须了解现在苏区是处在国内战争的环境,革命与苏区的发展,尤其是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以及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大战将要爆发,更使革命战争的对象,不仅与国民党军阀作战,且要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这就使战争的性质要开展到反帝国主义,同时也反国民党的民族革命战争。”^[13] 为此,中共苏区中央局就反帝运动发布了总动员:

必须立即动员群众进行反帝国主义运动,要根据这一决议案,在群众中作广大的宣传鼓动工作,要使群众中每一个人都了解目前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东三省和屠杀中国民众的祸害,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大战的危机紧迫,以及进攻苏联压迫中国革命的危险,而鼓动起他们反日反帝的热情,并使他们了解土地革命与反帝运动是不能分离的,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压迫中国民族的民族革命运动,仍是目前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但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及一切反革命派早已经投降帝国主义,早已经不在民族革命的战线之内,而且还压迫民众的反帝运动,因此,反日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与反国民党的斗争联在一起,苏区群众只有努力参加反国民党的革命战争,积极向外发展与全中国反日反帝运动汇合起来,并准备直接与帝国主义作战,才能赶走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出中国,才能消灭帝国主义大战在中国的祸害,中央局二月三日决议案,不仅为动员全苏区群众举行二月十八日的反帝示威,并且还应成为今后反帝的工作方针。二·一八的反帝示威,发展和成立反帝同盟的组织和援助白区罢工的募捐运动,要成为这一时期内检查苏区反帝工作的一个尺度。^[14]

综上所述,1932年初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出了清晰的指示,要求切实贯彻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加强对反帝运动的领导,迅速掀起群众性的反帝运动高潮,彻底摒弃过往中央苏区工作中消极对待反帝运动的“严重错误与缺点”,“必须立即动员群众进行反帝国主义运动”,反帝运动成为中央苏区革命工作的主旋律之一,甚至如何对待反帝运动成了辨别各级党组织是否与“立三路线”划清界限的一个标志。例如,中共闽粤赣苏区党第二次全省大会提出“有一个时期完全取消了反帝运动,继续立三路线,只要土地革命,不要反帝运动的传统。直到现在,反帝大同盟还是偏于形式主义,甚至有些同志以为成立反帝大同盟,多花了时间人力,妨碍了党和群众的工作,这是十足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15] 在这样的政治高度下,开展轰轰烈烈的反帝运动已迫在眉睫且成为事关路线问题的重要任务。而正

是反帝运动的迫切需求,成为中共寻求蔡孝乾进入中央苏区工作的主要动因。1932年6月,抵达汀州的蔡孝乾拜会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期间的一席谈话便清楚地揭示了中共的初始动机。周恩来表示“现在红军中很缺乏政治工作人员,苏区也需要文化工作者,你们来到苏区正适合‘革命’的需要。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运动高潮。你们是从日本帝国主义蹂躏下的殖民地来的。你们若能将在殖民地统治下的生活实况告诉苏区千百万老百姓,相信必定会在苏区掀起反帝高潮,这对‘革命’是极大的贡献。希望蔡同志多多协助他们把这项工作好好领导起来。”^[16]至此问题清楚了,中共主动邀请蔡孝乾到中央苏区工作就是出于在苏区掀起反帝运动高潮的需要,并且有意让他在其间发挥一定的领导作用。正如下文将要提到的,蔡孝乾肩负的主要任务就是在中共苏区中央局的领导下创建中央苏区反帝总同盟。

三

作为反帝运动的具体步骤,1932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开展红五月运动,号召各级党组织“应十倍努力的加紧扩大反帝运动”,“以革命的民族战斗来纪念‘五一’与‘五卅’!”^[17]其内容包括号召全国工人“举行广大的示威运动,检阅中国无产阶级的战斗力”,抵制日货、武装群众,抓紧进行瓦解白军的工作,组织游击战争,扩大苏维埃区域,等等。为达成此一目标,文件详细列举了需要立即着手实施的事项,如扩大群众宣传,刊印各类宣言、画报、小册子,成立各省反帝大同盟,“征调一定数量的工人到苏区与红军中去”。尤其是这份文件末尾的一段话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

最后,中央认为这些任务的完成,必须与左右倾的机会主义,立三路线的残余,消极怠工,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作无情的两条战线的斗争,必须彻底的经常的检查工作,发展严厉的自我批评,来保证红五月运动顺利的进行。各地党部接到此决议后,必须根据中央的指示,召集各种负责同志与活动分子的会议,并且在支部中详细的讨论,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形,作(做)成具体计划,督促全党去讨论执行。尽量动员负责同志与巡视员到各重要城市与区域,去布置这一运动(按:下划线为引者所加)。运动过去后,必须把工作的详细情形与工作总结报告中央。^[18]

回过头我们再仔细梳理蔡孝乾作为“台湾代表”进入中央苏区的轨迹,发现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首先,如前所述,1932年4月24日是中共地下党员李文堂找到寓居漳州的蔡孝乾,代表上级请他进入中央苏区工作。根据蔡孝乾的回忆录,李文堂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巡视员”(真实身份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苏区执行局委员),这恰恰与上引中共中央红五月运动文件中派“巡视员”到各重要城市与区域去布置运动的要求相符合。^[19]再者,中共中央红五月运动文件发布日为3月25日,地下党代表李文堂与蔡孝乾的接触日期为4月24日,时间也对得上。^[20]

其次,6月初,蔡孝乾等“台湾代表”行进到闽西龙岩,龙岩县苏维埃主席郭滴人等组织群众大会表示热烈欢迎,在这里他们遇见了来自广东五华的工人代表,随后两拨合为一股,一道进入了中央苏区,于是我们便看到了本文前引《红色中华》所刊载的关于“台湾代表”与五华工人在中央苏区活动的报道。同样,这也与中共中央红五月运动文件中“征调一定数量的工人到苏区与红军中去”的要求相一致。

再次,策划邀约蔡孝乾赴中央苏区工作的直接指导者,应是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长任弼时同志。任弼时早在1924年上海大学教授俄文的时候,就与该校的台湾学生蔡孝乾认识,1928年他化名彭荣代表中国共产党亲自指导了台湾共产党的成立,^[21]而蔡孝乾在台共成立大会上被推举为中央委员(虽然蔡本人并未出席成立大会)。台共在上海的活动被日本特务破坏后,蔡孝乾内渡活动于漳州、厦门一带,与中共地下党仍然保持着联系。随着反帝运动的蓬勃开展,正如周恩来指出的,身为殖民地被压迫人民的代表,蔡的出现将有助于反帝运动的深入,而漳州战役红军的到来,则给了二者直接联络的良机,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台湾代表”蔡孝乾便顺理成章地登场了。史料表明,蔡孝乾启程到

中央苏区,正是接到了任弼时的电报,要他随红军到中央苏区工作,时间是1932年6月3日。^[22]我们还认为,周恩来同志亦有可能是这次行动的领导人之一,理由如下:其一,蔡孝乾来到中央苏区后,周恩来立刻接见了,并当面交代了苏区党希望其发挥的作用;其二,周恩来亲自主抓了中央苏区反帝总同盟的设立活动,并在反帝总同盟成立大会上做了《目前国际形势和苏区反帝运动的任务》的主旨报告,邓颖超同志亦担任总同盟执行委员。这也体现了周恩来对反帝运动的高度重视与执行力。因此,这次蔡孝乾进中央苏区工作的事情,应当获得了周恩来的首肯,至少他是事先知情的。

最后,自4月底到6月初这一个多月的日子里,从漳州到中央苏区,蔡孝乾先后接触了多名中共重要领导人,包括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刘伯坚、龙岩县苏维埃主席郭滴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长邓子恢、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长任弼时以及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蔡孝乾作为一名台共党员,^[23]虽曾任中央委员,但毕竟不是主要负责人,名义上是台共创党一员,实际上并未参加上海的台共成立大会,如果是他主动要求进入中央苏区工作,虽也会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但远不至于受到如此这般的一路礼遇。显然这应该是中共为掀起反帝斗争高潮的需要主动邀约他进入苏区工作而做出的特殊安排,加上有了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组织部长任弼时两位中央苏区主要领导人的关心与加持,出现这一现象也就解释得通了。

通过上述分析,蔡孝乾作为“台湾代表”进入中央苏区乃我党出于反帝斗争需要的主动作为,触发二者联系的直接导因则为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开展红五月运动的号召。但是,中共接触并邀约蔡孝乾赴中央苏区工作是在4月24日,而任弼时发电要求其动身前往苏区是在6月3日,既然是与红五月运动有关,那么为何又在漳州徘徊延宕了一个多月呢?仔细观察,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漳州地方革命工作的需要。在红一军团工作期间,蔡孝乾除了负责编辑《红色战士报》之外,还与红小鬼宣传队一道下乡“做群众工作”,这些红小鬼多为来自闽西的客家人,需借蔡充当闽南语翻译以达到宣传的效果。漳州战役是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开展的外线作战,主要由赣南闽西及其他省份人员组成的红军队伍面临与苏区截然不同的语言环境,据红军各部的反映“红军占领漳州以后,宣传工作和群众工作很不够,工作效果很差”,“工作效果不大的主要原因是语言上的隔阂”。^[24]因而蔡孝乾的留驻,应该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方便就地开展群众工作。第二,蔡孝乾并未缺席红五月运动。5月中除了下乡从事“群众工作”外,蔡孝乾还参加了5月30日当天大规模纪念五卅运动大会,其在回忆录中写道“红军在漳城召开了一个‘人海’式的所谓‘纪念五卅运动群众大会’。事前,红军宣传队四处去‘动员’群众来参加,照例是利用‘群众大会’公审土豪恶霸,散发‘救济品’,制造出群众运动的‘高潮’。大会会场上空还出现了涂有镰刀斧头标志的红军飞机,凌空散发《告闽南群众书》传单,给予军民以极大的鼓舞。”^[25]换句话说,蔡是在漳州当地完成红五月运动的任务要求的。第三,蔡孝乾进中央苏区拟担当的主要工作另有安排。前文谈及周恩来在向蔡孝乾交代中央苏区期待其参与的工作时曾明确地要求,希望他以殖民地被压迫民众的身份揭露帝国主义的本质,并在这一领域发挥反帝斗争的领导作用。而中共期待蔡孝乾发挥作用的主要平台,就是参与创建中央苏区反帝总同盟。这虽然是中共中央、中共苏区中央局反复强调的重要工作,但并不存在时间上的急迫性。因此在这批“台湾代表”抵达红都瑞金后,1932年6月23日中央苏区反帝总同盟方宣告成立,蔡孝乾(化名蔡前)、施至善(化名施红光)当选中央苏区反帝总同盟执行委员,蔡孝乾并出任总同盟主任。^[26]其后蔡在中央苏区参与的主要活动包括出版《反帝战线》《反帝画报》《反帝拥苏通讯》等刊物,参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获选担任主席团成员,配合开展纪念“九一八事变”、拥护红军北上抗日等。

杜继东先生在评价蔡孝乾其人时曾经尖锐指出他在参加革命工作的历史上时常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在各类抗争活动中也不属于冲在一线的积极分子。^[27]结合其此次中央苏区之行,我们似乎也有同样的感觉。当中共地下党员李文堂请蔡孝乾到苏区工作时,他的第一反应是“犹豫”的,在回忆录中他这样写道“因为对于当时红军行动方向,前途如何,我还摸不清,进入苏区后能做什么工作,自

己也没有自信和把握。”^[28]这番话有两个要点值得关注:其一,它表明蔡孝乾事先并没有进入苏区的打算和心理准备。或许有人会说,蔡孝乾的回忆录撰写于变节之后,有可能因为某些可以想见的因素有意冲淡自己的红色印记,对此我们并不否认,其回忆录中的确有不少污蔑苏区革命斗争的言词。譬如在谈及龙岩县苏维埃的欢迎会时,他的描述是这样的“我从红军政治部和苏维埃政府这样‘热烈’的欢迎和我们在欢迎大会上所表演的情况观察,不禁有这样的感觉,红五军团政治部和龙岩县苏维埃联合举行这个‘欢迎大会’的用意,乃在于夸大地渲染‘白区’的‘黑暗面’,竭力吹嘘‘苏区’的‘光明前途’,为当时萎靡不振的红色战士打气。而我们——台湾学生、漳州工人、五华工人,不过是被‘红军’和‘苏维埃’利用为夸大宣传的工具罢了。”^[29]凸显了一个变节者的违心、阿谀嘴脸。但撇开那些言不由衷的托词,我们仍然可以从一些点滴动向窥见其真实心态。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红军打下漳州后,蔡只是上街四处观望,丝毫没有要联络红军的意愿,并冷漠地对待四处宣传革命而闯进他居所的红小鬼们,直到中共地下党人主动找上门来。其二,对于红军乃至中国革命的前途,他自认是“摸不清”的,实际上即是缺乏革命热情与坚定信仰。可以说,蔡孝乾是犹犹豫豫、瞻前顾后、被动地进入苏区参加革命工作的。我们并不否认其在中央苏区乃至后来延安时期配合着中国革命的需要,在党的领导下做过一些有益的事,但缺乏牺牲奋斗的坚定革命信仰,总是被动地被推着往前走,应该是蔡孝乾整个前期所谓“革命”人生的一大特点或弱点。这或许为其在面临生死抉择的关头变节背叛埋下了些许伏笔。

注释:

- [1] 关于蔡孝乾其人其事,可参阅杜继东的系列研究论文《留学上海——蔡孝乾红白人生研究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主编《林献堂、蒋渭水——台湾历史人物及其时代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台海出版社,2009年;《台共风云——蔡孝乾红白人生研究之二》,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主编《日据时期台湾殖民地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年;《红白之变——蔡孝乾红白人生研究之三》,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主编《台湾光复六十五周年暨抗战史实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
- [2] 《汀州各革命团体欢迎台湾代表和五华工人盛况》,《红色中华》第22期,1932年6月9日。
- [3] 《欢迎五华工人及台湾同志》,《红色中华》第23期,1932年6月16日。
- [4] 虞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台湾同胞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中国”》,《贵州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 [5] 《在苏区韩国、台湾民族代表为拥护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红色中华》第226期,1934年8月15日。
- [6][7][16][19][22][24][25][28][29] 蔡孝乾《台湾人的长征记录——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录》,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2年,第10页,第11页,第40-41页,第10页,第20页,第15页,第19-20页,第10页,第22页。
- [8] 参阅杜继东上揭系列论文。
- [9] 秦邦宪(博古):《论民众革命与民众政权的口号》(1931年12月25日),无锡市史志办公室编《秦邦宪(博古)文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167页。
- [10] 《反帝大同盟章程》(1931年8月28日),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34-735页。
- [11] 《政治决议案——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会通过》(1931年11月),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21页。
- [12] 《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之二——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1931年11月),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39页。
- [13][14] 《目前政治形势分析与党的紧急任务——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九日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政治决议案》,见《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第336、338-339页,第341页。
- [15] 《目前政治形势与闽粤赣苏区党的任务——中共闽粤赣苏区党第二次全省大会决议》(1932年3月5日),见《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第350页。
- [17][18][20] 《中央关于红五月运动的决议》(1932年3月25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三二年)》(第八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79页,第181页,第181页。
- [21] 参阅陈小冲、周雨琪《台共成立大会之中共指导者彭荣其人补论》,《台湾研究集刊》2016年第6期。

- [23] 蔡一度因党内矛盾被开除台共党籍,但仍为台共工作。
- [26] 杜文写道“反帝总同盟(又称‘反帝拥苏总同盟’)”(杜继东《红白之变——蔡孝乾红白人生研究之三》,第38页)实际上二者间并不能直接划等号,1932年7月10日苏区中央局文件载“要庆祝与拥护全国反帝大同盟代表大会开幕,要将反帝与拥苏两大同盟在八一运动中广大发展”(《苏区中央局关于八一国际赤色日的武装示威的决议》1932年7月10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三二年)》(第八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87页),显示反帝同盟成立时与拥苏同盟仍分属两个组织,是后来才合并为反帝拥苏同盟,史料记载中央苏区于1932年9月13日召开了红军反帝拥苏总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红军反帝拥苏总同盟开大会》,《红色中华》第34期,1932年9月20日)。任弼时在湘赣两省组织会议上代表苏区中央局对两组织合并的解释是“反帝与拥苏同盟:因这两个组织的任务是不可分离的,中央局决定合并为反帝拥苏同盟。”(《目前党组织上的中心工作》1933年3月15日,《任弼时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4页)。
- [27] 杜继东《台共风云——蔡孝乾红白人生研究之二》,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主编《日据时期台湾殖民地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年。

(责任编辑:陈忠纯)

A Taiwan Renegade's Pre "Revolution" History: A Probe into Cai Xiaoqian's Early History

Chen Xiaochong

Abstract: During the Agrarian Revolutionary War,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ushered in a number of "Taiwan representatives", one of whom was called Cai Xiaoqian who took part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nti-imperialist alliance by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and thereafter played a certain role in its anti-imperialist movement. The reason why Cai Xiaoqian went to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was simply because of the urgent need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vigorously carry out the anti-imperialist struggle and the red May Movement which were schemed by Ren Bishi, head of the ministry of Organization, and guided by Zhou Enlai, Secretary of the Soviet Central Bureau. However, when observing the early history of Cai Xiaoqian we can find that his clear characteristic or vulnerability lies in his lack of a firm belief of revolution and the passivity in his work, which may serve as a hint foreshadowing his later treachery.

Key Words: Central Soviet Area, anti imperialist movement, Taiwan representative, Cai Xiaoqian